

【導讀】

## 文學末世啟示錄

◎張淑英（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巴托比症候群》，是維拉馬塔斯的第十八部作品，也是西班牙知名文學雜誌《幻想》（*Quimera*）讀者票選二〇〇二～二〇〇九年十本具代表性的小說排序第二名。《巴托比症候群》以梅爾維爾的《錄事巴托比》為楔子，敘述一位上班族，在千禧年到來之前，克服自己二十五年來未曾提筆的心靈創傷，用書寫一個月的日記的方式（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八月七日），另增頁腳眉批，評論一些「看不見的文本」，開啓了一連串他對文學的探索與詰問，解釋作家創作與不創作的理由。

書中闡述的寫書情結，宛若《紙房子裡的人》（*La casa de papel*）的尋書經歷——作者多明格茲（C.M. Domínguez）引用康拉德的《陰影線》（*The Shadow Line*），交互指涉，牽引出愛書人的蒐藏之旅與心理的癡迷／謎。有「巴托比症候

群」的作家，則彷彿被一條陰影線遮蔽切割，在是／否寫作間游移又猶疑。

《巴托比症候群》敘述西方文壇少產、多產或不產的作家，例如魯佛、韓波、沙林傑、阿爾發、葛哈克；或是瓦爾澤、儒貝爾……等等；他們如何構築負面思維，身（深）陷「不」的迷宮，以至於終生遲遲不創作；或是經典一出手，就此封筆；或是享盡盛名卻毫無著作；或是著作等身之後頓悟，斷然拋棄文學。「拒絕、放棄與沉默」似乎是巴托比症候群的症狀三部曲，好似所謂的「魔咒」，緊箍作家的手與頭。另外一群人，例如瑪麗安娜·榮格、特拉文、品瓊則是神祕的「藏鏡人」，不輕易暴露身分，讀者無從得知這好作品抑或壞作品的主人是誰。

維拉馬塔斯透過《巴托比症候群》尋奇，也提供了不少名人軼事：文壇健筆如貝克特、希梅涅茲、托爾斯泰、塞萬提斯、王爾德等人，也有倦勤向文學說「不」的境遇（或在愛妻辭世時；或在自己撒手歸西前；或飲酒買醉取代筆耕）。這裡面，每一位作家向文學道別的經歷都是一則獨特的作者生平導覽，串連出巴托比群像，儼然是文人小百科。在邁向新世紀當兒，維拉馬塔斯不可免俗地運用後設小說和互文性的技巧，以黑色幽默的筆觸反思經典作品與現代文學、作家創作的路徑與

困境：寫或不寫；能（會）寫或不能（不會）寫；為何創作，怎樣文學；這是所有執筆的作家共同面臨的宿命與抉擇。

文學是一個千古大哉問的議題，寫作也是一種風險。在維拉馬塔斯之前，許多作家也都提出類似的質疑和省思。梅爾維爾的「巴托比」，原是一位律師事務所抄寫員，這樣的角色，和阿根廷作家馬可·德涅比（Marco Denevi）的〈快樂的謄寫員〉（*El escriba feliz*）更貼近。德涅比在這篇極短篇中諷刺作家不一定要會寫作，只要有一位具有文學素養、稱職的潤飾文膽即可，他們是共生共榮的連體嬰。「快樂的謄寫員」以揶揄名作家夥伴自娛「愚」人，而「名作家」為名利甘受戲謔。維拉馬塔斯用了不一樣的體例重述德涅比嘲諷作家的虛榮與盲點，指出此種「名譽」與「榮耀」是荒謬的。一個「名字」與一篇「文字」之間會形塑一種從屬和所有權的關係，變成創作的窒礙。

西班牙詩人政治家甘波阿莫（R. de Campamor）寫實風格強烈的詩風，在領航時期書寫的〈誰懂寫作！〉（*¡Quién supiera escribir!*）詩篇傲視同儕，道出他個人對韻文書寫和詩風的獨到見解，但是他的作品卻在唯美的現代主義風潮披靡下迅速

被煙沒。在大江東去的浪濤裡，甘波阿莫的際遇可也是「巴托比症候群」的作家之所以不再寫作的疑慮？貝雷茲·雷維特（Arturo Pérez-Reverte）的《大仲馬俱樂部》（El Club Dumas）指出大師如大仲馬，亦不諱言他有一個蒐奇出點子的寫作團隊，以便應付連載小說每日刊登的壓力。瓜地馬拉小說家蒙特羅梭的寓言故事集——《動物禪》（或譯《黑羊》，La oveja negra y demás fabulas），除了《巴托比症候群》裡提到的〈最聰明的狐狸〉（身無分文又帶憂鬱性格，於是決定當作家！），還有兩篇涉及寫作主題：一篇是〈想當諷刺作家的猴子〉：猴子爲了洞悉人性而廣結善緣，最後卻因交遊廣闊、諸多顧忌而寫不成任何一篇諷刺故事；另一篇〈寓言作家和他的書評家〉，描述寓言作家完全同意書評家犀利嚴苛的批評，以致於書評家已無話可說。蒙特羅梭這簡短精要、鞭辟入裡的寓言集，猶如凹凸鏡，讓寫作的糾葛一一顯影。巴特的《寫作的零度》試圖扭轉激進文學的結構主義的論述，或是「作者之死」的辯證，則間接在文學批評層次平添作家的「巴托比症候群」。

《巴托比症候群》一開始是解析「不寫作的作家」的症狀，好似宣示文學末日

的悲劇；漸次地，作者不斷延伸，擴充探索的範疇，進而描述「寫不完」的作家的現象，例如加達和艾南德茲等人，在創作的歷程中，似乎永遠意猶未盡，致力雕琢「沒有結局的藝術」，創造「未完」與「待續」的謎團。這是一種技巧的鋪陳，也可能是作家的瓶頸。從第三十章起，開始延伸耙梳「反巴托比症候群」，喬治·西默農、羅伯特·穆齊爾，甚至加達都是「反巴托比」的作家，正如維拉馬塔斯說：「一開始我可能在寫停止創作的作家，最後我更著重的是，那些活著卻停止寫作的人。」因此，也有必要凸顯另一端對位的作家的樣貌。小說中，維拉馬塔斯寫出千面作家的性格與容顏，甚至虛構了何柏·得韓（維拉馬塔斯的「他我」）；偏執狂貝雷斯——這位作家，因擔心被剽竊而不寫。維拉馬塔斯在這兒影射了今年六月辭世的諾貝爾文學獎薩拉馬戈創作靈感的來源。文學大師如薩拉馬戈，也有波赫士所謂的「生命之虎」——難以超越的無限。維拉馬塔斯解析這幾多症候群的意圖，即為替寫作找尋出路，讓末世的憂心轉化為期望的啟示錄。也是小說一開始便有的伏筆：

再不堪、再痛苦的經歷，每個人都難免想要透過記憶，找回那些突然湧上心頭的片段與感動。而唯一的方法，就是「寫作」。

特別是在這個道德日益淪喪的年代，人們的眼光總是冷漠、迴避。而「文學」，即使我們再怎麼逃避、忽略它存在的價值，它依舊是不讓過去遭人遺忘的良方。

又如，作者引用德爾·朱帝切的小說，在他闡釋「寫作之不可能」後，仍試圖開拓新視野，提出追尋新理想的可能，而推論出「寫，總還是比不寫好」的結語。即使小說最後認為托爾斯泰以巴托比的告別式離開人間，末世的滄桑也正意味啓示的轉折，從「不」的迷宮中解脫出來：「做你所當做」。維拉馬塔斯曾說了一個矛盾修辭，說他之所以寫作是爲了不想當作家，只爲了讓人讀他。他在寫作與作家之間又畫出一條陰影線。其實，所有的讀者都是不寫作的作家，而讀者，沒有「不」的迷宮；閱讀，是最精緻且價廉的旅行，有讀者，就有作家。